

唐朝前期移民河西考

杨作山

(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,宁夏 银川 750021)

摘 要:唐朝前期,为巩固西北边疆,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,在河西地区建立屯牧制度,进行移民实边。同时,设立羁縻府州,安置各族降户;鼓励商业贸易,招徕西域商旅,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。

关键词:唐朝;河西;移民

中图分类号:K24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1-0491(2007)02-0081-05

收稿日期:2006-05-23

作者简介:杨作山(1962-),男,土族,甘肃天祝人,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。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教学与研究。

唐朝前期,在平定薛举、李轨割据政权后,为北防突厥,西御吐谷浑、吐蕃,锐意开发河西,从唐太宗统一中国到玄宗统治的百余年间,唐朝通过移民实边,屯田、屯牧,安置少数民族,鼓励商业贸易等一系列措施,恢复和发展河西地区农牧业生产。这一时期,河西地区社会相对安定,民族关系比较和睦,农桑繁盛,士民殷富。

一、建立州县机构,恢复农业生产

唐朝在平定李轨割据政权后,在河西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、行政制度。唐武德二年(619),“平李轨,置凉州总管府,管凉、甘、瓜、肃四州。凉州领姑藏、昌松、番和三县。三年,又置神鸟县。七年,改为都督府,督凉、肃、甘、沙、瓜、伊、芳、文八州。贞观元年(627),废神鸟县。总章元年(668)复置。咸亨元年(670)为大都督府,督凉、甘、肃、伊、瓜、沙、雄七州。上元二年(675),为中都督府。神龙二年(706),置嘉麟县。天宝元年(742),改为武威郡,督凉、甘、肃三州。乾元元年(758),复为凉州”。睿宗景云二年(711),唐又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为河西道,并设立节度使。河西道除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外,还包括西域广大地区。

玄宗开元年间,为防止吐蕃、突厥对河西地区的侵扰,增设朔方、陇右诸节度使,重新部署边防兵力。河西节度使统领九军二守捉,分布在凉、肃、瓜、沙、会等州,治所在凉州。陇右节度使统领十军三守捉,分布在鄯、廓、洮、河等州,治所在鄯州。天宝元年(742),“河西节度断隔吐蕃、突厥,统赤水、

大斗、建康、宁寇、玉门、墨离、豆卢、新泉八军,张掖、交城、白亭三守捉,屯凉、肃、瓜、沙、会五州之境,治凉州,兵七万三千人”。^{[1](卷二一五)}天宝十三年(754),哥舒翰又在黄河九曲一带设置宁边、威胜、金天、武宁、曜武五军,新设各军不在节度使固有兵额之内。屯军平时耕牧,战时出征,许多屯军后来成为当地屯户。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,河西地区汉人多为原来军户之子孙。州县制度的确立,军备制度的完善,较好地发挥了稳定河陇地区的作用。

《元和郡县志》云:“凉州武威。中府。开元户二万六千一百六十五,县一十五。”

《通典》卷一七四《州郡四》载:武威郡领姑藏、神鸟、番禾、昌松、嘉麟五县,有户 25 693,口 128 192。张掖郡领张掖、删丹二县,有户 6 639,口 23 304。酒泉郡领酒泉、福禄、玉门三县,有户 2 106,口 7 912。晋昌(瓜州)郡领晋昌、常乐二县,有户 1 167,口 3 800。敦煌郡有户 6 395,口 32 234。

《新唐书》卷四十《地理四》载:天宝年间,凉州武威郡有 22 462 户,120 281 口;沙州敦煌郡有 4 265 户,16 250 口;瓜州晋昌郡有 477 户,4 987 口;甘州张掖郡有 6 284 户,22 092 口;肃州酒泉郡有 2 230 户,8 476 口。

按《通典》的统计,当时河西地区共有 42 000 户,195 442 人。而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统计,天宝年间,河西各州共有 35 718 户,172 086 人。平均每户约 5 人。尽管各种典籍对唐代河西地区户口的统计不尽相同,但出入不大。

此外,《旧唐书》卷四十《地理三》:凉州中都督府条还载:“吐浑部落,兴昔部落,阁门府,皋兰府,庐山府,金水州,蹕林州,贺兰州。以上八州府,并无县,皆吐浑、契苾、思结等部,寄在凉州界内,共有户五千四十八,口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。加上这一数字,河西地区至少有 40 766 户,189 298 人。”

除国家编户外,河西地区还有大量屯军。唐朝屯田始于高祖武德年间,“贞观中,李靖破吐谷浑,侯君集平高昌,阿史那社尔开西域,置四镇……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,缿帛为军资,有屯田以资糗粮,牧使以挽羊马。大军万人,小军千人,烽戍逻卒,万里相继,以却于强敌。”^{[12](卷一九六)}调为戍卒的山东丁男可能是河西地区的最早屯军。武后垂拱二年(686),陈子昂在巡视河西后上疏:“甘州诸屯,皆因水利,浊河灌溉,良沃不待天时。四十余屯,并为奥壤,故每收获,常不减二十万。但以人功不备,犹有荒芜。今若加兵,务穷地利,岁三十万,不为难得。”^{[13](卷八)}甘州地区土壤肥沃,灌溉便利,但因缺乏劳力,未尽地利。凉州“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,突厥、吐蕃频岁奄至城下,百姓苦之”。长安元年(701),郭元振为凉州都督、陇右诸军大使。他在凉州南北分置和戎城和白亭军,控其要冲,拓州境二千余里,“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,尽水陆之利。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,及汉通收率之后,一缿余数十斛,积军粮支数十年。元振善于抚御,在凉州五年,夷、夏畏慕,令行禁止,牛羊被野,路不拾遗。”^{[11](卷二〇七)}神功元年(697),武后诏“娄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,仍兼校河西营田事。”^{[12](卷九十三)}以宰相知河西营田事,可见武后对河西屯田之重视。《唐六典》卷七《屯田郎中》载有玄宗开元年间全国屯田数目,当时“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”,其中河西道共有军屯 154,包括赤水 36 屯,甘州 19 屯,大斗 16 屯,建康 15 屯,肃州 7 屯,玉门 5 屯,安西 20 屯,疏勒 7 屯,焉耆 7 屯,北庭 20 屯,伊吾 1 屯,天山 1 屯。在这 154 屯中,大约有百屯在河西走廊境内,占全国屯数的 10%强。

河西屯田还有民屯,土地属屯军。民屯是把土地按一定数量交给征发来的丁夫耕种,名为屯丁、屯户或营田户。他们实际上是均田制之外的自耕农。屯户被包括在屯军人数之内,抑或隶属国家编户,目前尚无定论。河西屯户中还有一些发配来的犯人。如玄宗开元九年(721)五月“原见囚死、流罪随军效力,徒以下未发者”。开元十六年正月,“许

徒以下囚保任营农。三月辛丑,免营农囚罪。”^{[4](卷五)}

唐政府为加强对河西编户的管理,还括还逃户,设置并健全乡、里建制,以使流散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来。《长安三年(703)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》称:甘、凉、瓜、沙等州“以水田稍宽,百姓多悉居城,庄野少(人)执作。沙州力田为务,小大咸解农功。逃进投诣他州,例被招携安置”。于是官府下令括还沙州逃户,并对其实行种种优抚,努力使他们回到原有的土地上。但是,唐前期逃户问题一直禁而未绝。《唐会要》卷 85《逃户》载天宝八年正月敕令云:“其有逃还复业者,务令优恤,使得安存。纵先为代输租庸,不在酬还之限。”玄宗开元、天宝年间,河西人口虽有所增加,但逃户现象仍时有发生。“以开元之承平,而户口犹不及汉之盛时,唐兴以来,治日少而乱日多也。”^{[1](卷二一四,胡注)}唐前期对河西人口增殖作了很大努力,缓解了劳力严重不足的矛盾,但未能彻底改观。

二、抚御各族降户,安置流亡汉民

河西地区历来为华戎杂居之地,所谓“欲保秦陇,必固河西,欲固河西,必斥西域”^{[5](卷六三)},即指河西地区地理位置之重要性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正义引《括地志》云:“凉、甘、肃、延、沙等州地,本月氏国”。自战国至秦,河西地区为月氏、乌孙居地。匈奴破月氏,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。武帝元狩二年,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,并将其众合四万人来降,置五属国以处之。以其地为武威、酒泉郡。莽曰张掖。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,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。”^{[6](卷六)}汉武帝在河西置张掖、酒泉、敦煌、武威四郡,昭帝又置金城郡,谓之河西五郡。东汉时期,“立屯田于膏腴之野,列邮置于要害之路。驰命走驿,不绝于时月,商胡贩客,日款于塞下。”^{[7](卷八)}前凉、后凉、北凉、北魏统治时期,大量少数民族入居河西,使这一地区的民族成份更为复杂。隋大业三年,“炀帝西巡,次焉支山。高昌、伊吾使及西番胡二十七国,谒于道左。”后破吐谷浑,拓地数千里,遣兵戍守。“诸蕃慑惧,朝贡相续。”^{[8](卷六七)}随着丝绸之路的通畅,中原汉商和西域胡商纷纷入居河西。《隋书·食货志》云:“河西诸郡,或用西域金银之钱,而官不禁。”可见河西地区胡商之多。

唐太宗平定突厥后,突厥、回纥、党项、吐谷浑及西域诸胡纷纷内附。唐朝通过设置都护府、羁縻府州,册封,和亲,封爵,贡赋、版籍不上户部等措施对少数民族进行羁縻统治。

武德三年(620)五月,“以秦王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、使持节、凉、甘等九州诸军事、凉州总管,其太尉、尚书令、雍州牧、陕东道行台并如故。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。”^{[1](卷一八七)}同年九月,“突厥莫贺咄设寇凉州,总管杨恭仁击之,为所败,掠男女数千人而去。”^{[1](卷一八八)}六年(623)六月,“丙寅,吐谷浑内附”^{[1](卷一九)}。处之于河西地区。

武德八年(625)八月,“突厥、吐谷浑各请互市,诏皆许之。先是,中国丧乱,民乏耕牛,至是资于戎狄,杂蓄被野。”^{[1](卷一九一)}太宗贞观元年(627),“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,性粗暴,左右百余人,皆无赖子弟,侵暴百姓;又与羌、胡互市。”赐幼良死。^{[1](卷一九二)}河西地区诸族杂居,民族矛盾尖锐。唐与少数民族间存在着官方的和民间的互市贸易。

贞观三年九月,“丙午,突厥俟斤九人帅三千骑来降。戊午,拔野古、仆骨、同罗、奚酋长并帅众来降。”^{[1](卷一九三)}是年,“户部奏: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,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。”^{[1](卷一九三)}贞观年间,唐曾收纳流亡汉人和归降突厥120余万人,安置于边地,其中或有部分安置于河西,但人数与地点很难稽考。

贞观四年,又有“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。”^{[1](卷一九三)}六年(632),“十一月,辛巳,契苾酋长何力帅部落六千余家诣沙州降,诏处之于甘、凉之间,以何力为左领军将军。”^{[1](卷一九四)}同年,“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。”^{[1](卷一九四)}《唐会要》则载内附者达三十四万口。^{[1](卷一九四)}他们大多被安置于河西、陇右。但贞观九年(635),“春,正月,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。”^{[1](卷九十八)}高宗总章二年,唐在打败高丽后,将其数万余众徙居内地,其中一部迁至凉州。^{[2](卷四)}

高宗龙朔三年(663),“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,逃奔吐蕃,具言吐谷浑虚实。吐蕃发兵击吐谷浑,大破之。”^{[1](卷二〇一)}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及弘化公主率残部退至青海之北、祁连山南麓一带。咸亨元年(670)四月,唐高宗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,以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、左卫将军郭待封二人为副,将兵十余万,讨伐吐蕃,且援送诺曷钵还故地。八月,大非川之役,唐军大败,死伤殆尽。诺曷钵率余部数千帐徙居凉州南山(今祁连山东端北麓)。咸亨三年(672)二月,诺曷钵率部徙居鄯州浩门河流域,但因山川狭窄,并畏吐蕃之强,不安其居,遂徙灵州。唐设安乐州居之。自大非川之战后,吐谷浑余部多至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诸州附唐,有的甚至远徙灵州。7世纪末,吐

谷浑人不堪忍受吐蕃无休止的征发和繁重的赋税劳役,大批逃亡唐朝,就近降附河西等地。

武后长寿元年(692)二月,“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,分置十州。”^{[1](卷二〇五)}圣历二年(699)四月,吐蕃将“赞婆帅所部千余人来降,太后命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,以赞婆为特进、归德王。钦陵子弓仁,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,拜左玉钤卫将军、酒泉郡公。”^{[1](卷二〇六)}赞婆率领所部守凉州东南之洪源谷。是年七月,又有“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。”^{[1](卷二〇六)}但其所投之地不明,可能仍在河西、河湟一带。此后,又有不少吐谷浑部落投附唐朝,或被唐掳掠而来。

玄宗开元十一年(723)四月,吐蕃首领张甘松投唐,授员外镇将,留宿卫。^{[10](卷九十五)}是年九月,有吐谷浑部落至沙州内附。《通鉴》云:“先是,吐谷浑畏吐蕃之强,附之者数年;九月,壬申,帅众诣沙州降,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。”^{[1](卷二一一)}

此外,凉州有回纥、契苾、思结、浑诸部5048户,17212口。其版籍不上户部。

九姓胡是西胡之一。唐武德元年(618),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建牙千泉(碎叶附近),役属九姓胡。显庆四年(659),唐灭西突厥,在西域置羁縻州府。九姓胡改宗唐朝。神龙三年(709),大食灭安国。先天元年(712),大食灭康国。天宝十年(751),怛逻斯战役后,石国丧失独立,九姓胡又改宗大食。自1916年伯希和发表《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》^[11]以来,中外学者对九姓胡东方聚落的研究,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,都取得明显进步。探讨所及,涉及六胡州、沙州、凉州等地。

隋末唐初,九姓胡中的石、康两姓,各由首领率部移居伊州和鄯善。河西重镇凉州,是九姓胡商必经之地。据《魏书·西域传》《粟特》条载,早在5世纪中期,“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”。唐初,流寓凉州的九姓胡商旅,聚族而居,盘根错节,尤以安氏一族最著。河西李轨政权的兴衰便与凉州胡人有关。《通鉴》云:“李轨吏部尚书梁硕,有智略,轨常倚之以为谋主。硕见诸胡浸盛,阴劝轨宜加防察,由是与户部尚书安修仁有隙。”修仁兄兴贵,仕长安,表请说轨,轨不听,于是“退与修仁阴结诸胡起兵击轨,轨出战而败,婴城自守”。“兴贵执之以闻,河西悉平。”^{[1](卷一八七)}唐肃宗至德二年(757),“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,聚众六万。武威大城之中,小城有七,胡据其五,二城坚守。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

以二城兵攻之，旬有七日，平之”。^{[1](卷二一九)}仅此可以看出九姓胡在凉州举足轻重。另敦煌从化乡，高昌崇化乡的杂居胡姓民户，均按乡、里编籍，计丁授田。他们以务农为主，是一批胡姓的庶民。

唐宋之际，甘、凉、瓜、肃、兴元(今宁夏银川)、青唐城(今青海西宁)诸地均有大批来自阿拉伯、中亚的商旅居留。《西湖游览志》断言：“宋代穆斯林之来中国，留居贡道不归者，早在唐、宋已为数甚多。”在唐代，住唐的阿拉伯、波斯商人享有法律上的以及宗教上的照顾。《唐律疏议》卷六云：“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，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”。唐代“波斯、阿拉伯人亦由陆路进入中国，在凉州、长安、洛阳等地贸易，且有远至辽东者”。^{[12](P360)}《甘宁青史略》也说：“终唐之时，唯甘、凉、灵(今宁夏灵武市)有回族。”大批胡商进入河西经商，对促进河西地区商贸发展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
唐政府在平定河西后，较好地处理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，河西地区与西域之间的经济、文化交流得到恢复和发展，这为后来河西地区经济、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。

三、鼓励商业贸易，招徕四方商旅

唐太宗贞观年间，平定高昌，建立安西都护府，中西交通逐渐顺畅，与西域诸国的往来趋于频繁。唐太宗在打败西突厥后说，“西突厥已降，商旅可行矣”，鼓励商人贩运。中西贸易有贡赐、民间互市、地方机构参与等形式。商人大多来自突厥、吐蕃、回纥、大食、波斯及西域等国家和地区。官方贸易虽不以河西为始发地，但各国、各族贡使频繁经过河西，促进了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。民间贸易较之官方贸易更显频繁。当时，凉、甘、肃、沙、瓜州各地都设有市场，商品云集。在河西地区的丝绸贸易中，胡商无疑起了重要作用。

河西及周边地区民族众多，各族人民生产、生活方式有别，民族间的贸易也就显得格外重要。尽管唐与少数民族间频有战争，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并未因此而断绝，即便在敌对政权之间，战争间歇也多次互市。吐谷浑、党项、突厥、吐蕃都曾请求互市，无一例外。在双方和好的时期，更是“甲兵休息，互市交通”，“彼此丰足，皆有便宜”，呈现出“蕃汉非常快乐”的局面。^{[13](卷四十)}粮食贸易是河西贸易的基础，民族间的互市是河西贸易的重要内容，河西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其它过境商品的贸易是河西贸易繁荣的标志。除了来自西域的各族商队，河西及其附近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贸易活动，

也在河西贸易中占有一定地位。农牧产品可以满足交通要道上行旅的需求，供与需的吻合是河西商业繁荣的基本条件。

唐前期，在河西地区的贸易活动中，逐渐形成了凉、甘、沙、肃州等贸易中心。凉州是当时的河西首府，也是最大的商业都会。唐天宝以前，长安为世界第一国际都市，洛阳、成都次之，其它如太原、荆、扬、幽、广、汴诸州，商业亦盛。凉州地处东西交通要冲，其繁盛仅次于荆、扬，而在幽、广之上。贞观初，玄奘在路过凉州时说：“凉州为河西都会，襟带西蕃、葱右诸国，商旅往来，无有停绝。”^{[14](卷一)}元稹在《西凉伎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吾闻昔日西凉州，人烟撲地桑柘稠，葡萄酒熟恣行乐，红艳青旗朱粉楼。……狮子摇光毛彩豔，胡姬醉舞筋骨柔。大宛来献赤汗马，赞普亦奉翠茸裘。”^{[15](卷二十四)}不仅反映了当时凉州的繁荣景现，同时也反映了胡汉、蕃汉人民和睦相处，互市交通的一面。

杜佑《通典·食货志》云：“西至蜀川、凉府，皆有店肆，以供商旅，远适数千里。”《新五代史·吐蕃传》也说：“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，凉州最大，土沃物繁而人富乐。”^{[16](卷七十四)}以贩运丝绸及丝织品为业的西域胡商，纷纷来到凉州等地经营丝绸贸易。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《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》中写道：“凉州七城十万家，胡人半解弹琵琶”^{[17](卷一九九)}，这里的十万家或许有所夸大，但足以说明凉州确为市况富盛，人口众多，胡汉杂处的大城。开元二十二年，唐蕃双方在赤岭会盟并树立界碑。开元二十五年，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与吐蕃将乞力徐约和，撤去树栅、守捉，于是“吐蕃畜牧被野”。^{[2](卷一九六)}开元末年，吐蕃人已在天梯山下和南山山脉诸纵谷中游牧。

甘州是河西第二大城，也是主要产粮区。从贞观年间直至开元、天宝之际，河西地区胡商麇集，道路相继，大批胡商专程到甘州贸易，有些还定居于此。

沙州为河西交通枢纽，是丝绸之路西段三条路线的总始发点，其贸易状况不亚于凉、甘二州。敦煌与吐鲁番文书中，有许多关于兴生商贾在沙、瓜二州进行贸易的记载。《唐开元二年(732)三月瓜州、沙州给石染典过所》及《唐开元二一年(733)正月西州百姓石染典买马契》两件文书，为我们再现了西州商人在瓜、沙两地进行贸易活动的情况。据《沙州图经》记载，敦煌周围设有清泉、白亭、阶亭、双泉、悬泉、黄谷等21个驿站、邸店。其所载“石城镇”是外国商人聚居之地。驿站周围

往往形成商品集散地,也有民办的客店、商铺和手工业作坊等。唐政府还在较大的客商聚集地设市,委派市令管理,查禁“违禁品”,征收商税。敦煌以西百里的兴胡泊,则是通过玉门关道,往返胡商居止之地。另外,敦煌还是大批康国商人聚居地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云:“元宵灯会,长安第一,敦煌第二,扬州第三。”看来,敦煌的贸易可能比凉、甘二州更为兴旺。

肃州也是河西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,但较凉、甘、沙稍逊。岑参《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》云:“琵琶长笛曲相合,羌儿胡雏齐唱歌。浑炙犛牛烹野驼,交河美酒金叵罗。”在河西重镇这次胡味极浓的酒席上,有胡乐、胡歌、交河美酒。

见刘昫《旧唐书》(卷40)《地理三》。关于河西节度使设置的时间,诸史记载不同。《唐会要》卷78节度使条云:“景云二年四月,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,充河西节度使,此始有节度之号,遂至于今不改焉”。但《资治通鉴》卷210,睿宗景云元年(710)十二月条云:

参考文献:

- [1] 司马光.资治通鉴.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2] 刘昫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3] 陈子昂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- [4] 欧阳修.新唐书.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5] 顾祖禹.读史方輿纪要.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5.
- [6] 班固.汉书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- [7] 范晔.后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
- [8] 魏征.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
- [9] 王溥.唐会要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.
- [10] 王钦若.册府元龟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4.

唐代,河西地区的贸易仍以丝绸中转为主,西域胡商携带大量珍宝到河西求购丝绸,汉商则运丝绸至河西进行贸易。大批胡商客居河西,促进了河西瓷器、珍宝、药材、粮食和驼马的交易。天宝末,进士鲍防在《杂感》一诗中描述西胡入贡的盛况时写道:“汉家海内承平久,万国戎王皆稽首,天马常衔苜蓿花,胡人岁贡葡萄酒。”¹¹⁷(卷三〇七)

如上所述,河西及其周边地区除了过往和定居的波斯、大食等国“胡商”、“胡贾”外,还分布着吐蕃、吐谷浑、党项、突厥、回鹘等众多少数民族,民族间的贸易活动是河西商品经济的重要内容;不同民族间的经济交往,构成了西北地区民族迁徙、融合的经济基础。

“置河西节度、支度、营田等使,领凉、甘、肃、伊、瓜、沙、西七州,治凉州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通典》卷32、《新唐书·兵志》作景云二年,而《新唐书·兵志方镇表》则为景云元年。

九州:凉、甘、瓜、鄯、肃、会、兰、河、廓,皆李轨所据之地。

- [11] 伯希和.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[A].冯承钧译.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(第二卷)[C]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95.
- [12] 方豪.中西交通史[M].台北: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,1983.
- [13] 董诰.赐吐蕃玺书[A].全唐文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.
- [14]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15] 元稹.元氏长庆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.
- [16] 欧阳修.新五代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7.
- [17] 岑参.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[A].全唐诗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
[责任编辑 方建春]